

從大都市區及世界城市形態來看亞太地區的全球化、經濟危機 和城市政策問題*

王曉曉** 徐敏傑*** 郭小妮**** 編譯

摘 要

在亞太地區，貿易全球化、工業生產及財政問題，將快速化的城市轉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大都市之內。在這些都市區內，為爭當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間的競爭，伴隨著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來臨而日趨白熱化。政府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大量公共資源投入，旨在於吸引全球投資的環境建設上，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應運而生。它們包括相容性的管理和建造更適宜居住的城市環境；新形式下的城市貧困問題，面對日以增長的全球化經濟動盪和空間上的不均衡而造成的經濟反彈能力低下。伴隨著公民社會作為政治事件而日以興起，強調的重點被集中體現在城市本身，而不僅僅簡單地侷限在世界市場中的經濟實體和消費群體上，更有甚者還演變成了各種形式的政治群體的競技場。

關鍵字：大都市區 世界城市 全球化 亞太地區 都市化

* 本文系根據“Mega-urban Regions and World City Formation: Globalis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 Vol. 37, No. 12, 2315-2335, 2000)一文翻譯而成。該文原作者為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Mike Douglass, 研究方向：全球化發展、移民及國際經濟競爭。本文作者聲明，本文的翻譯、發表及修改均已獲上述原作者的授權許可。

** 美國伊利諾理工大學 (IIT) 建築學博士生, Email: slsw@hotmail.com。

***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 (MSU) 城市與區域規劃學碩士生。

****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 (MSU) 國際規劃研究學碩士生。

Mega-urban Regions and World City 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

Wang, Xiaoxiao^{★★} Xu, Minjie^{★★★} Guo, Xiaoni^{★★★★}

Abstract

In Pacific Asia,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finance underlies an accelerated urban transition focusing on a limited number of mega-urban regions.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world city status among these regions has intensified following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With governments compelled to devote greater amounts of public resources to creating a built environment to host global investment, a number of key policy issues are emerging. These include demands for inclusive governance and more livable cities; the appearance of new forms of urban poverty; low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growing global economic turbulence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as a political force,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calls for a sharper focus on cities not simply as economic agglomerations or collectivities of consumers in the world market, but also as arenas for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Keywords: Mega-urban, Regions, World City, Globalisation, Pacific Asia,
Urbanisation

★★ Doctoral Student,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American, Email:
slswa@hotmail.com

★★★ Mast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of American

★★★★ Mast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of American

1. 亞太地區都市化的全球化趨勢

都市化和全球化是發生在亞太地區的兩個相互交織一起的進程，它們劃定了當代社會、政治、經濟轉變的界限。儘管在世界歷史、政府、商業團體和社會群體已經抓住，並掌握了都市化中一個最強烈和最集中的進程。但是城市結構上大規模擴展的推動力，目前還仍然停留在國家內部的平臺上加以運作。面向整個世界的貿易，用於工業生產上的城市投資、跨國間合作網路內部中的全球內部貿易以及超越金融資本上的迴圈模式，構成了以上總結的所謂“全球及本土”背景下發展模式的基本元素。

都市化和全球化相互依賴、相互強化。在一個既定的城市裡，旨在於加強塑造城市形式和一系列的顯著活動，反射出了與全球化資本迴圈之間的聯繫模式。與此同時，擴展這一迴圈模式要求建造一系列的人工環境，不僅僅去建造單個的城市，而且還要建造適於在全球層面上，作決策的本土型和國家型的城市網路（Sassen, 1994）。

伴隨著第一個都市紀元的開始，城市人口遷移的步伐持續加快，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平均每年超過 3%。這一數字是同期農村人口增長速度的三倍（UNDP, 2000）。城市地區每年吸引超過 6100 萬人口，相對而言，農村地區卻只有 2500 萬。到 2005 年，半數以上的世界人口都將居住在城市之中，而到 2025 年，這一比例將達到 3/5。儘管一直到“二戰”結束之後，從世界範圍來看，大多數的城市人口都還集中在歐洲和北美，但現今居住在城市地區的大約 25 億人口，有 2/3 集中在中低收入的國家。這一現象體現出了城市化進程，一直到現在都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亞太地區是全球城市化進程的主力軍（見表 1），從世界範圍內來說，未來 25 年內，可預見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將會是歐洲和北美的 4 倍。世界城市人口在未來 25 年內將增長 30%，這一數字意味著城市人口將淨增 7.5 億。儘管中國在這一增長過程中佔有很大的比例，但是別的國家的比重也維持在相當的水準上。到 2025 年，估計約有 50 億人會居住在城市之中，亞太地區的城市將會在這一數字中占到大約 30% 的比例。

潛在的城市建設和重建時期形，成了所謂“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這裏，通過整合三個主要的巡迴關係來定義「經濟」這一術語。它們是資本→工業生產、商品貿易和財政金融→全球化的尺度。“全球化”是一個以插入式歷史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大量實實在在新的元素、經濟結構形式、國家-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以及科技進步的出現上為特徵的過程。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全球經濟真正地進入到了全球化的領域。對於亞太地區來說，從 20 世紀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的那段時間，成爲一段全球化勞動力分配的新時期。這一新的時期主要表現爲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一系列有選擇的新興工業化經濟的轉變。首先體現在亞洲“四小龍”身上-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隨後又進入到了東盟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而後範圍則要窄一些，主要表現在菲律賓、越南和近期的中國。

在這一時期的較早階段傾向於一系列分支工廠的發展模式，然而經歷了高速的城市工業和經濟發展之後，所謂的“發展”還僅限於技術革新和向高階層服務的工業生產的部分形式的轉變上。在 20 世紀 90 年代，這一地區的經濟在從低工資的密集型產業的轉變過程中經歷

了一系列的困境，新型的“全球化”空間層面開始漸漸明朗和清晰。這一轉變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來自跨國公司的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到財政金融迴圈控制、工業產業投入、技術推廣、轉包合同、專利、特許經營者以及策略聯盟，逐漸開始取代完整意義上的工業生產企業。這一轉變在全球化的內部交易體系中作為一種產生前所未有的高堆積率途徑加以操作。這一轉變也加大了全球範圍內，國家間投資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這些投資解除了基礎設施，以及別的障礙上的損耗，還有比如職工工資的開銷，更廣泛意義上的當地生產企業中勞動力本身所產生的花費。這些損耗和花費由中央和當地政府、企業和勞動者承擔，而且其比重日趨增加。

表 1 1995 年到 2025 年間亞太地區城市人口的增長趨勢(Source: UNPD-1994)

國家/地區	城市人口增長數(1000s)	占世界總增長數的百分比(100%)
整個亞太地區	749,035	29.43
東亞地區	510,726	20.07
中國大陸	476,283	18.72
朝鮮	10,786	0.42
中國香港	239	0.01
日本	6,427	0.25
中國澳門	149	0.01
蒙古	1,500	0.06
韓國	15,342	0.60
東南亞地區	238,309	9.36
汶萊	146	0.01
柬埔寨	6,568	0.26
印尼	100,368	3.94
老撾	3,317	0.13
馬來西亞	12,520	0.49
緬甸	23,985	0.94
菲律賓	42,447	1.67
新加坡	534	0.02
泰國	17,269	0.68
越南	31,155	1.22
高收入地區	172,246	6.77
全世界範圍	2,544,822	100.00

全球化概念中的第二個新的元素，就是當地與全球金融市場的結合，在亞太地區由於流入了大量的短期間接的投資導致了 1997 年的金融危機。儘管在大多數國家，經濟似乎都在復甦，但是全球的金融資本，已經被果斷地以一種新的和穩固的空間形式，添加到了國家的經濟發展上了。由金融體系而導致的危機仍然處於高發的層次上，在相關國家所進行的改革僅僅是部分被完成了，全球金融體系仍然難以捉摸。向巡迴和地理區域上迅速轉換的能力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領域，在這裏使企業變成了間接的投資者。

金融全球資本化已經成爲了現階段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三個因素中的一部分，名曰：「在巨大的合作中合併和獲得恒定的波濤起伏。」，這一巨大的合作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一兩百萬美

元發展到 2000 年的 1000 億美元 (UNCTAD, 2000)。憑藉將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轉變成創造中小型媒介轉包合同網的模式，跨國公司們開始將金融資本向集中在捕捉高附加值的收購、合併和戰略聯盟的模式去大規模的擴展。

所有的這些傾向於導致國家間經濟合作的活動脫離了國家間的商業基礎，而朝向工業生產分配及金融財政全球化的合作圈，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初才形成。在國家間合作網內操作的世界商品和服務業循環體系的份額，已經由 2/3 增加到了 3/4。根據聯合國的資料 (UNCTAD, 1995, p.xxii)，目前這種聯盟貿易組成了所謂“全球化世界經濟工業生產的核心”，但是這種聯盟貿易受到公平交易中自由市場理論的影響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下降。

世界經濟的轉變隨著亞太地區核心地位的不斷增長而變日趨複雜，由於 20 世紀 70 年代，拉丁美洲和別的地區屈服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壓力而誘發債務危機，所謂新型化工業國家的數量日趨減少 (Athukorala, 1989)。日本作為世界經濟力量中的一員迅速崛起，與此同時快速完成工業化的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作為一種新的跨越國家間界限的旋風席捲亞太地區。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這些後起的經濟發展實體都已經從主要外資接收國轉變成了投資國，這一現象尤其表現在以密集型勞動和低收入分配形式為主體的東南亞地區。由於日本長期的經濟低迷和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了在未知尺度上這一地區大的經濟結合體之間的合併和重組 (Douglass, 2000b)。

2. 大都市區在經濟空間發展上的體現

所有這些近來的全球性轉變都與亞太地區都市化的現代趨勢有著直接的關係。全球化的工業生產、商業發展以及金融資本需要一個實實在在形體上的城市範圍、城市網和傳遞及資訊溝通之間的連接去實現其空間上的擴展。在亞太地區，這一地理範圍的形成是現代都市化進程的主要情節和輪廓。

以上提到的大多數都是資訊溝通和交通運輸上革命性的轉變，這些提升和轉變使在一些少數全球化的中心形成了經濟實體的聚合，同時又不斷地在資源、工業生產、生產型服務等領域，和全世界的行政職能離心化去形成一個執行即時任務的全球網，從而進行資訊的交換和決策。文獻的趨勢是過分地誇大了遠端資訊處理中的“虛擬網路空間”，同時沒有充分地評估出對於發揮全球化功能的主體能動性和提供悠雅的生活方式，建造公路、鐵路及航空連接樞紐過程中對於人造環境中形體上的需求。在日趨增加的大工程的建設過程中，人造環境的創立是發生在亞太地區重大政治爭論點的代表之一。

推動都市化和創立城市形體的主要力量體現在針對全球化投資在國際化城市間競爭的白熱化。當投資變得日趨自由化和商品運輸成本大幅度下降的時候，當地的相對優勢已經從以自然資源，和老工業基地為主轉化成了在城市的人造環境中創造資產的推動力。這一變化從特殊工業對於穩定的電力和水源、勞動力多元化和交通基礎設施到比如醫院、大學、公園等便民設施以及為重大國際事務而準備的國際會議中心等，具備高檔功能的服務設施應有盡有。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研究引入了新的理念，同時又已經開始論證在全球化和空間轉換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表現在大型城市區域的成長和形成上。由 McGee 在 1991 年提出了都市

區域的延伸，後又定義出了特大城市區域的概念（MURs）。這一概念集中在車輛運輸交通和幹線高速公路系統上，使得都市圈之間的日間聯繫從行政上和傳統的郊區核心凝聚轉向沿著都市中心，向外擴充 100 公里的都市間走廊的農村區域擴展（McGee and Robinson, 1995）。當這些區域的核心部分正被以全球化金融體系、聯合體和工業生產服務功能為主體的高層商業住宅所填充的時候，大多數這些曾經被稱為城市周邊的區域正成爲一個魔幻般的充滿所謂“門禁社區”的社會景觀。這些“門禁社區”在每一棟房屋裏，在爲高爾夫運動取代莊稼而種植的草坪中，在爲來自國外的企業而修建的工業廠房裏，和比如在農場上修建的國際機場等，一些新的適宜全球化發展功能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中（以 Kuala Lumpur 熱帶雨林爲例）都充滿了巨大的衛星天線。

亞太地區不僅在世界城市人口中佔有日以增長的比重，而且在世界大城市區域中人口比重也在不斷地增加，東京城市內目前擁有 4 千萬人口，占日本國總人口的 1/3，位居世界特大城市區域之首。接下來是有 3 千 7 百萬人口的上海城市，和中國的幾個人口超過 2 千 5 百萬的特大城市區域群（表 2）。在其他國家，主要大城市區域群也佔據了國家和地區人口中很大的比重：首爾城市幾乎占了韓國人口的一半；臺北城市擁有臺灣人口的 37%；馬尼拉城市裏居住著馬來西亞總人口的 1/3；曼谷和吉隆坡城市各占了它們國家總人口的 1/5。

表 2 在日趨延伸的都市內集中的國家人口數

國家及特大城市區域	人口數(百萬)	占國家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中國	1200.2	100.0
上海	37.3	3.1
北京	26.3	2.2
香港-廣州	28.0	2.3
瀋陽-大連	26.9	2.2
青島-濟南	24.2	2.0
印尼	193.3	100.0
雅加達	17.1	8.8
日本	125.2	100.0
東京	39.5	31.3
大阪	16.8	13.4
名古屋	8.7	6.9
北海道	8.3	6.6
馬來西亞	20.1	100.0
吉隆坡	4.2	20.9
菲律賓	68.6	100.0
馬尼拉	16.0	23.3
泰國	58.2	100.0
曼谷	11.6	19.9
新加坡	3.0	100.0
韓國	44.9	100.0
首爾	20.2	45.0
釜山	6.0	13.4

臺灣地區	21.2	100.0
臺北	7.9	37.3

在大多數情況下，大都市區人口的增長率超過全國的水準，並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持續增加。在東南亞，例如雅加達、曼谷和吉隆坡等城市在不到 15 年的時間裏人口增加了近一倍。預計到 2025 年，曼谷城市圈的總人口將占到泰國人口總數的 40% (Kaothien and Webster, 1998)。

強調這些城市聚集體的重要性絲毫不為過，據統計記錄顯示，許多特大城市區域的國內生產總值佔到了其所在國的一半左右。與此同時，它們在亞太地區中所占人口比例的份額也迅速增長，它們正在成為超越日常生活下，城市品質中連接經濟全球化和當地政策的主要壓力點，這些壓力主要是由特大城市區域中的兩極化發展而引起的，這種兩極化的發展又由全球化趨勢下每個國家自身背景的結構性變化和全球化的進程所推動。儘管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進程中實現了高度的文明化，亞太地區的國家由於全球化的發展聯繫變得日趨緊密，正在經歷一個未曾有過的城市空間發展形式：集中在一個或者幾個特大的都市區裏，包括日本（亞洲第一代新型工業化國家）、第二代新型工業化國家-東盟成員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以及被稱為傳統經濟型國家的中國和越南。

韓國的經歷尤為顯著，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所形成的巨大的跨國綜合企業財團，導致了它的近海分支機構從二類城市向低收入的東南亞城市以及中國擴展。與此同時，首爾經歷了生產性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偏移，導致了其迅速地擴展到了周邊的京畿省 (Kyonggi)，最終形成了首都特大城市區域圈。在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在大都市區之外的大多數中等城市和農村地區中都經歷了來自大都市的所謂“合圍”。當首爾的人口超過了在所謂“反磁力”的釜山-永南地區之外的所有省份人口之和後（這一地區自身當時正在處於嚴重的經濟低密期），首爾的持續都市區擴大在 1988 年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由於 1997 年的金融危機，首爾的特殊地位又一次推動了處於搖擺狀況之中的聯合體進一步向前發展。同時，美國、日本和歐盟的企業在獲取韓國綜合企業財團的方面也已經進入到了一個炙熱的階段，旨在於吸引全球投資的加速城市間競爭的國家政策又理所當然地受到了首爾的青睞 (Kim, 2000)。從 1990 年每年吸引外資不到 10 億美元，到 1999 年韓國吸引外資總量超過 150 億美元，在形成過程中，收購聯合體的部分佔有最大的份額 (Korean Herald, 2000; Douglass, 2000c)。

在後起的工業化國家：泰國、印尼、菲律賓和近年來崛起的越南，兩極化的發展趨勢與在城市核心地區直接吸引外資的空間上的聚集密切相關。在 20 世紀 80-90 年代的印尼，雅加達城市區域的擴展，明顯要快於 70 年代的發展速度，緊鄰雅加達城市地區的工業區人口的增長速度每年超過了 8 個百分點；曼谷由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經歷了一次類似的快速發展。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泰國幾乎 3/4 的外國投資都來自於曼谷城市地區，人口的變化也緊跟著這個城市形式的發展步伐，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曼谷平均每年人口增長 20 萬左右。

馬來群島作為在檳榔嶼上的自由港是柔佛巴魯（馬來西亞南部柔佛州首府）與新加坡之間的連接樞紐，而吉隆坡的發展經歷了正好相反的過程，吉隆坡和其周邊的重工業區-Klang

Valley 正在經歷著別的國家曾經有過的高度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尤其表現在污染和環境問題上。在菲律賓，儘管出臺了分散工業發展和在蘇比克灣美國軍事基地以外的地方，建立大規模的加工出口區域的政策，但是作為大都市的馬尼拉的人口和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超過了其他地區。

在中國，談到的特殊尺度和兩極化的發展，發生在沿太平洋邊緣的區域地帶上，它們是北京-天津-上海-珠海三角洲一線的都市化發展進程。儘管在中國的許多省份視建立經濟特區為吸引外資的法寶，但是最成功的案例往往還是發生在沿海大都市區的周邊區域（World Bank，1997a）。

大都市區正在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和通道的連接點，而這些重要的交通樞紐和連接點又是日以興起的國家化城市網的基礎（Rimmer，1999）。包括在大阪、名古屋、首爾、香港和吉隆坡等重要機場的興建；從釜山到首爾、從香港到上海以及沿馬來群島西部海岸快速鐵路線的修建；和從越南中心的港口城市經老撾和泰國向滇緬邊境公路大陸橋的鋪設。

大都市區也正在成為形成跨境區域發展過程中的焦點，這些跨境區域正在憑藉消除在國家之間形成勞動力流動壁壘的狀態下，產生的投資和工業產品輸入過程中的障礙來實現勞動力的“袖珍型”國際間的分割（Parsonage，1992；Douglass，1998）。這些都是建立在典型的釋放和解除管制空間（被用於創立吸引國際投資和加工出口區域、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別的有指令性的增長上-在此始終提供特殊的補貼，諸如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免稅期和來自政府的基礎設施撥款）上的誇大版本。

在亞太地區，最著名的跨境區域是新馬印三國經濟開發區（這個開發區是由新加坡鄰國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巴淡島設置其國內，已經不再批准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項目而創立的）。儘管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的一體化合作依然是在一個經濟層面上不同的收入水準和政府職權為全球化大生產而進行緊密合作的代表。隨著時間的逝去，過去在香港為出口而設定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生產轉向了內地，首當其衝的就是深圳經濟特區，而後在珠江三角洲延伸成了一個正在形成擁有一千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地區。

在這裏為數不多而又極其明顯的例子有：中國環渤海灣與韓國西南地區省份相結合的環行經濟區域，這可能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最大規模的跨國跨區域連接專案。這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起的圖們江流域開發專案，它包括至少五個積極的參與國：中國、蒙古、朝鮮、韓國和俄羅斯。這些國家擁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森林、礦產、煤、穀物和農作物，同時也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深海不凍港口以及連接著歐洲和日本海外市場的鐵路、公路和海洋。

大都市區、國際間開發走廊和跨國區域都是國際間領土在空間轉換上的一部分。這些形式的空間轉換是通過將快速的城市化轉變進程，融入到在經濟相互作用各種形式上超越國家界限的廣泛空間聯繫上。亞太地區的邊緣在全球體系中被看成是一個有機的經濟整體。而這個全球體系是由最初的表面上，由這一區域內政府之間為尋求空間排列和都市等級所進行的強化競爭，而變得更加賦予戲劇化了，在這一競爭中的最高等級集中在面向世界城市，而進行的旨在於重塑大都市區公共政策的明確出臺和使用上。

3. 向國際化大都市的轉變

幾乎每一個國家，擁有極端的城市化現象的大都市區數量是極其有限的，政府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大都市區中，使得它們能夠保持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競爭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亞洲收入較高的新興工業經濟區域，政府傾向於具有顯著特色的重要都市區演變成世界型城市。巨大的市政工程、高密度的商業區域、全球性的航空中心、大容量的深水港和高速鐵路與公路的快速通道，在這些城市的重建中以高密度的建設在世界城市的舞臺上展開競爭。

儘管早在 1915 年“國際化大都市”的概念就已經被 Geddes 提出了，而後在 1966 年為 Peter Hall 所再次引入，但據 Sassen (1997) 看來，這些概念在早期其作用並不在於整合，從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進行的跨國間區域合作的過程。Friedmann 著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國際化大都市的猜想》一書，被認為是一個關於全球化的積累作為掌握全局服務而出現的一種特殊城市聚合體，在理論和實踐政策上關於實質體的一個邏輯性較強的初步設想 (Sassen, 1991; Clark, 1996; Knox and Taylor, 1995; Friedmann, 1996; Taylor, 2000)。在現代全球化的過程中，這些城市已經轉變成了關於投資、市場狀況以及管理的“巨大資訊的聚合點” (Sassen, 1997, P.12)。在亞太地區國家中，大型都市區域中的改造和重建被認為正是針對這個功能而來的。

儘管近年來，有憑藉經驗來定義和測量國際化大都市狀況的傾向 (Short et al. 1996, Taylor, 2000)，但是一個城市是否符合世界型城市的標準尚無明確定論。有關這問題，有些研究，Markusen 和 Gwiasda (1994) 發現紐約相對於美國和海外的其他一些城市正，在逐步喪失其全球化的功能。他們指出即使在富裕的經濟發達國家，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也不是永久的，而是逐步地被城市間的動態競爭所部分地取代。試問“作為經濟實體和貿易增長不斷變化的亞洲，像東京、香港和首爾這樣的亞洲城市能否成為某些國際化功能運作的所在地呢？” (Markusen and Gwiasda, 1994, P.187)。他們嘗試性地探討了國際化大都市在全球領域變遷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在國際化大都市中不僅應該通過地理位置，而且還應該通過公共政策來實現巨大合作和整合的可能，這一假想正在亞太地區逐步展開。相反地，在理論和資料都十分缺乏的狀態下，從日本到新加坡甚至別的国家，政府已經開始實行了提倡大都市區向國際化大都市轉變的發展戰略。大阪、名古屋、北京、上海、臺北、香港、吉隆坡和新加坡甚至一些規模較小的都市區，比如日本的北九州和菲律賓的宿霧等地，在經濟旅遊領域都得到了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鼓勵。

對於大型城市來說，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因素多種多樣，當然也包括增添國家的自豪感。這裏面，大多數的政府從低收入的密集型生產平臺，向高技術高度合作的工業生產服務中心轉變中，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很成功的。其他因素包括從第三世界國家向第一世界國家的轉變、從文化邊緣地帶向全球化消費的文化特徵以及通過跨國合作基於合法化的制度來保持創造者（這已經成為一個貫穿地區的國家發展意識形態的共同基石）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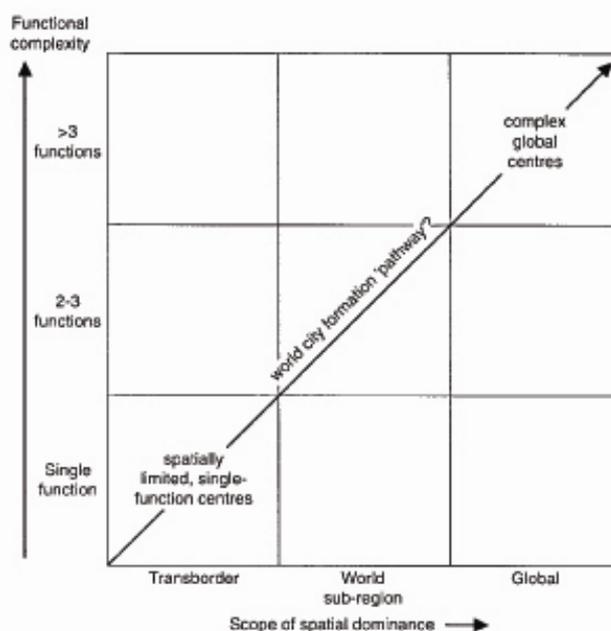
正如 Friedman 在 1986 年所說，一個城市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定位，與它本身融入全球經

濟的程度有著直接的關聯。從這一觀點中可以看出，國際化大都市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動態的過程。它由兩個主要的因素所組成 空間範圍和功能層次（如圖 1 所顯示）。

沿著功能性聚合體之軸線，8 種類型功能與國際化大都市地位息息相關：

- 金融（銀行、股票、房地產、保險）
- 跨國間商業合作總部（商品生產及物流配送）
- 全球化服務（教育、高新技術生產配套服務）
- 交通運輸（世界性航空中心、快速鐵路、大容量的深水港）
- 資訊情報（創造、處理、分發）
- 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調整國家-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
- 文化（文化實體、實踐、事件的產生、大眾化和分發）
- 重大的國際性事件（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博覽會、國際性會議、大型音樂會）

圖 1：國際化大都市的形成：空間範圍和功能層次



根據 20 世紀 90 年代初關於這些功能的相關資料，在每一欄挑出了處於世界上最高等級的前 15 個城市，報告顯示亞太地區有 6 個城市至少具備一項全球性的功能（Short et al., 1996）。東京可能是個例外，在大多數的文獻裏，它可能被假定為處於一流狀態和水準的國際化大都市，但是它的許多全球化功能隨著日本幾十年來經濟的停滯而發生了動搖。至於亞太地區其他候選城市，在國際化大都市的文獻裏至多也只是被認為是處於第二和第三等級之中（Friedman, 1996； Taylor, 2000）。韓國政府似乎也接受了這種觀點，現在開始鼓勵首爾在

東北亞地區成爲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與日本和中國的北方城市，而不是紐約和倫敦展開競爭。同理，香港和新加坡也受到政府的鼓勵，在國際性大都市的功能和地位上相互競爭。

在現有的政策表述下，國際性大都市的功能主要由以下幾種方式加以實現：(1). 由來自政府的津貼和國際投資者的擔保，來實現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2). 以投資者的身份，向國際社會大規模的出售新的城市形象景觀的活動。鼓勵首爾成爲國際性大都市的一系列努力，闡明了其他城市可以借鑒或產生共鳴的東西：

- 使從首爾到釜山的時間控制在 2 到 5 個小時的高速鐵路。
- 沿著黃海邊緣橫跨中國上海-北京-瀋陽-山東半島的軸線，連接韓國鐵路軸線的發展走廊。
- 與最終抵達歐洲大陸的跨蒙古鐵路相連接的黃海交通運輸軸線。
- 建立具有 4 個 4000 米跑道、24 小時內容納 155 架次飛機，成爲東北亞地區國際航空樞紐的新的首爾國際機場。
- 通信運輸、傳統中心區、高新技術工業區吸引了國際重大事件和高新技術投資的目光 (Kwon, 1997, P.159)。

韓國的投資者期望將這些所有的投資定位在韓國的巨大經濟結合體，綜合企業財團所服務的東北亞地區，城市工業發展和國際貿易網。這個網路以首爾爲頂點，首爾從一個低收入的製造業中心轉變成形式中的、網路城市 (Castells, 1989) 和跨國控制中心，此重新定位被認爲是對這些集團和國家支配型經濟的成長和擴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香港、新加坡以及臺灣都有些相似的發展規劃。投資 200 億美元的新的國際機場，在香港隨著 17 億美元的電信數碼產業，和在亞洲成功贏得投資 28 億美元，迪士尼樂園的修建權而建成 (Orwall, 1999; Hilsenrath and Coleman, 1999)。新加坡推出了第四個發展計畫，使其成爲亞洲的資訊中心和世界上由“全盤意義上和規劃上高品質的工作、居住、學習和娛樂的環境，來留住和吸引頂尖的人才所組成的所謂“科學棲息地”且由 Changi 國際機場爲了拉近全球距離所提供的電腦和資訊化體系，使其成爲世界上第一個電訊金融工業園 (Corey, 1997, P.190)。臺灣的新竹高新技術工業園區包含了一個滿足和容納來自美國矽谷地區長年工作回國人員需求的美式學校。然而，這個學校僅僅是爲儲備新竹工業園的工作人員而服務的，並不對附近的社區居民開放 (Dolven, 1998; Lubman, 1999)。

爲成爲國際性大都市高端領域的創新，已隨吉隆坡週邊延伸的多媒體超級走廊而興建所謂“多媒體大學”，將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帶入到一個新的高度 (MDC, 1998, P.1)，未來的多媒體大學夢幻之城，不僅僅是因爲擁有齊備的技術，還有從劃痕和擦傷中建設來滿足和適應佔有者的需求於這個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中心區域，多媒體大學是爲了多媒體公園而創立的，在於創造一種氛圍去提升知識員工的技術創新力。政府已經制定了一個目標，使多媒體大學成爲一個“近似於零放射”的城市，它將成爲世界上“生態友好”處於最高頂級的地區。

耗資 30 億美元的多媒體超級走廊，被要求和期望通過數位城市的綜合模式來提升馬來西亞的國際競爭力 (Corey, 1997)。這個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中心區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機場，它被當作是亞洲的網路中心來加以設計和投入使用的，在這個 15*50 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這

個走廊的整體面積超過了新加坡。

這個超級走廊的首要點集中在吉隆坡，它擁有世界第一高樓約 446 米的石油雙子塔，這個城市還計畫在其周邊地區新建 22 個辦公區，這一系列的發展都是為了在世界城市舞臺上彈射出一個大的都市區域而努力的。從 1995 年開始，整個多媒體超級走廊將根據前總理馬哈蒂爾所言“有一天將出現一個可與東京、橫濱等城市相媲美的千百萬人口的大都市”（MDC，1998，P.1）。現在吉隆坡大都市區域的人口剛剛超過了 4 百萬，大約是東京都市區人口的 1/10。

現在越來越成為熱點的全球城市形態和城市間的競爭作為一個相對新的領域正在吸引展覽會、歡宴典禮和別的重大國際盛會。在日本，城市通過名古屋舉辦的國際設計博覽會、札幌舉辦的國際美食節、大阪舉行的花卉園藝博覽會、築波舉辦的科技博覽會、2005 年瀨戶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以及東京贏得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雖然未能成功舉行）來提升日本城市的國際關注度。

這些重大的事件在當地的經濟發展中指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儘管主要還是在依靠人與人面對面交流的技術基礎上，但是它們還是國際資訊交換和決策體制網路中日趨增長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新的城市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空間裏，人們更願意跋涉數千公里去面對和接觸異國風情去提升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和民營企業家正致力於用人為的文化背景，和所謂“傳統”方式去改變都市的模式（將其從伴隨著貧民窟似的工人住房的煙囪工業時代，具有特殊的服務設施和迷人的文化韻味的社會轉變）去填充城市的空間。

對任何一個指定的城市來說，甚至在尺度上更為保守的亞太地區，誰都不能保證具有國際化大都市的功能和空間上的位置。城市間的競爭變得更加白熱化，其利害關係也日漸突出，其角力排列中的成與敗顯得更為重要，而難以從一般意義上的模式中去預期其特殊的效果。1997 年到 1999 年間的亞太地區經濟危機已經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層面上突顯出了這個被遺漏的問題。最後，來自政府假定成為一個國際型大都市的強烈願望和傾向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上的問題，同時迎合投資者的直接需求處於優先的地位，使得城市變得更加的適宜居住和在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層面上處於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之中，為國家和當地去穩固和吸引來自國外的投資。

迎合與全球化相對接的一系列大專案的失敗使得這一戰略已經處於高度的風險之中，也稱作在世界城市等級中下滑到了邊緣地帶，以及經濟社會財富的下降。從 1986 年到 1998 年，在指標上依賴於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城市數量，從起初的僅僅 30 個增加到了超過 140 個（UNCTAD，2000）。這一現象表現出了在世界經濟中，一次深刻的自由主義的釋放和在為爭奪全球投資的競爭者數量上的飛躍，如同國際間競爭一樣，在每一個國家內部城市間競爭數量的激增。這就不奇怪為什麼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會積極地去擴充公共撥款中的份額來吸引和保持全球投資。

都市化進程的加速起步階段正在亞太地區的空間體系中獨立，同時在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投資和國家資源的層面上得以創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城市和區域上的聯合體正在被創立和整合，將達到一個僅次於政策介入的層面，在許多情況下，成本高的禁令將填充到像環境基礎設施、大規模運輸系統和住房等基礎領域所形成的缺口中。因此，在興起的外向型

和開放型的都市化進程中，尋找重大事件的解決辦法成了當務之急。

4. 一些關鍵問題

即城市和地區，在全球的過程中“創造性的破壞”和重建中繼續發揮作用。這些重建工作，目前也是亞太地區成就的一個信號。壓力雖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也是促使其提高效率的關鍵，不僅在城市規劃和管理領域頗為關鍵，並且在國家與民間社會關係，環境的可持續性與經濟增長生活機遇有關的諸多問題中也尤其關重要，舉例可總結為五個方面：1). 治理問題；2). 適宜居住城市和城市環境管理；3). 可持續發展經濟；4). 社會公義和城市貧困問題；5). 不平衡空間發展及對農村的忽視。

4.1 治理問題

在亞太地區中，正密集進行混亂的城市化進程和城市改造過程，首先出現的問題便是治理問題，伴隨著城市化和大型城市地區的增長，體現在政治管理上新出現的複雜之社會、政治、經濟形勢。

面對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民間社會的崛起並在政治治理方面起了主力作用（Douglass and Friedmann, 1998; Sandercock, 1998）。這使得具有廣泛的政治意識之中產階級和一個有組織的工業勞工組織的出現成為了必然，全球經濟一體化不僅為在城市工業增長過程中所出現的這些階級提供了貢獻，並且在技術的支持下，它促進了一般公眾進一步獲取關於他們自己狀況、所受的教育程度、國外生活經驗等的資訊。亞太地區城市居民現在可以更加瞭解他們的政府和多角度的觀點，即便在某些政府封鎖消息的情況下也可以知道。

使人民更加的瞭解世界變成了滿足人們需要的一種資源。民眾對其需求正在超越對物質福利渴望、可信賴、民選政府的需求，及將經濟收益轉化成更宜居住城市的習慣。在一些國家裏，這些渴望導致了根本的政治改革，而其在 10 年以前是不可能實現的，比如：民選政府，包括在韓國和臺灣多黨制和選舉當地政府官員的產生；在菲律賓重新實施民選政府制度；在泰國，將軍隊設置成政府的左膀右臂；在印尼，蘇哈托新秩序政府的倒臺和在多黨制下自由選舉的出現；其中，東帝汶在公民投票下的獨立是民間社會在亞太地區最顯著的進步。

變化中的政府在對於民間社會的回應問題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那些民主改革向前推進的國家裏，非政府組織（NGOs）已取得進展。其中很多非政府組織通過與政府的協作，放棄了對抗性的運動成為積極的角色，以建立政策的優先事項和方案。其他的非政府組織則繼續受到鎮壓，但即使在這些情況下，其普遍的目的是實現政治改革和更多的參與治理工作。在中國，小規模的非政府組織多是人數眾多並且屬於非正式性質的，目的在與政府打交道時，為其提供法律和其他的服務（Forney, 1998）。

即使伴隨著變化，對治理的更多參與制度將成為一個明確無誤的趨勢，這種參與制度將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政策。“發展型國家”模型對於那些擁有強大武裝，並提供經濟增長的政府來說是壓制政治自由、以及對那些鼓吹政府不再提供合法政治制度之呼聲的歉意。越來越多的政府必須通過其他手段自正其身，這些手段不僅包括民主改革，更重要的是結束通過排外和不透明的決策過程，以及官商勾結和一邊倒的著重經濟收益而忽視城市適宜居住的特性來構建城市的方式。

4.2 適宜居住的城市

矛盾充斥在追求全球性主導的經濟增長和使城市成爲更適合居住的棲息地之間。全球化這樣的邏輯需要曼哈頓地平線上有大量公司運作，具有財務職能的工商業支援服務，大型基礎設施以建設城市網路，大規模的出口加工區和其他國際使用區，如外籍家庭居住的特別住房區域。由城市的環境建設產生的結構調整，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對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老的社區和小商店已在城市中心消失，城市的住宿消費已經成爲抑制大多數城鎮職工在其居住的原因，最後的結果，是長期影響時間和交通堵塞，貧民區聚集在環境退化區域和垃圾堆埋場周圍。曼谷擁有一千多個貧民區，總計人口約 150 萬；中國有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他們屬於用完即棄的工人，並且他們工作的城市被剝奪了住房權。繼經濟危機後，在日本和韓國，無家可歸者的數目已頗具規模。

在目前都市化的時代下，大部分前殖民地城市已成過去是，全球影響的網路經濟空間已經取代城市成爲城鎮居民生活的一個綜合生活空間（Friedman, 1988）。在建設熱潮的推動下突然獲得巨額的、來自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和臺灣出口的製造業和紡織業巨額的外商投資，同時，曼谷展現出高速的經濟發展，在 1984 到 1988 年期間，有超過十萬人聚集在距離曼谷中心 10 英里半徑內。首爾在過去的十年中，數以百計的土地發展專案造成了 300 多萬人（約 30% 的城鎮人口）的遷移（道格拉斯，1998）。

在亞太的大都市圈內，抵制大規模重組城市居民區每天都在發生。1994 年，慶祝首爾建成 600 年，發生“漢江”段橋樑坍塌，時間多達三次，使連任的市長下臺，並成爲大規模的對政府與企業所造成的破壞，和城市生活水準的道德義憤的契機之一。雖然結果不同，反對鬥爭對於貧民窟拆遷，小資本商業街區的清除，大規模減少耕地以擴大城市區，空地的減少和增長失業再次發生的時間，已經成爲城市政治生活中的例行公事。

對於可居住城市的一個無可否認的中央層面就是乾淨的環境，其包括了安全的飲用水、乾淨的用水管道、有效的固體廢物的處置和管理、清新的空氣和未受污染的土地（Douglass and Ooi, 2000）。綠地、便捷快速的交通系統，大大緩解交通堵塞，被視作一個良好的城市環境的一部分。在亞太地區，除了新加坡這個可能的例外以外，實際和理想相差甚遠。河流、土地和空氣受到的污染遠遠超出了政府對於健康和安全的最低標準，汽車使用的無節制增長嚴重地影響了交通堵塞及空氣品質。

在亞太地區的大都市區中，治理污染造成的健康和生產成本，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曼谷治理空氣污染的年花費已經達到 30 億美金，吉隆坡及巴生河流域 16 億美金；雅加達約 10 億美金。在馬尼拉，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花費約爲每年 1.2 億美元（WRI, 1996/97）。在中國的城市中，肺癌的死亡率是全國癌症死亡率的 4 到 7 倍（Williams, 1994）。在曼谷和雅加達的每個城市裏，空氣污染造成了每年 1000 到 2000 人的死亡；上門尋訪醫生更達 25000 到 100000 人；“行爲障礙”和“呼吸道症狀”人數達數百萬之巨（Brandon, 1994）。

對於許多城鎮居民，特別是城鎮較貧者而言，城市的環境使他們的生活受到了威脅，嬰兒

死亡率的首要證據便是飲用水的潔淨程度、食物和洗浴的水質（UNESCAP, 1993）。在大多數大城市中，污水收集系統幾乎是不存在的，城市失去了水源以及固體廢物處理堆填區的地點。海水已經闖入雅加達中心的地下水中，使得家庭和企業傳統水井的使用成爲不可能；城市管道供水同樣受到限制，比如受污染和不時的中斷服務。

在污染程度每年遞增 10%到 20%的情況下，工業和運輸部門的生產成本預期上升，不僅表現在醫療費用和死亡率方面，並且表現在資源日益減少和不可逆轉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環境品質的下降下，採掘工業部門出現了減產的趨勢（Brandon, 1994）。

4.3 城市和國家經濟的維持

在不斷加大的、將稀缺的資源用來吸引國際投資的壓力下，存在一種危險，即在短期內的成功可能導致某一國家或城市長期競爭優勢的下降。努力吸引業界往往導致的結果是避免對投資者徵收其運作的真正環境成本，這樣做可能是在初期成功地吸引了投資，那些不能成功保持其環境的城市地區可能會開始被遺棄，並促成那些生態環境惡化並不嚴重地區的有利地位（World Bank, 1993）。兩難的困境是如何保持城市地區的環境可持續性發展，並同時保持有效投資的競爭（Angel and Stone, 2000）。除了新加坡的城市外，其他的城市地區還沒有一個明顯的成功例子，能夠成功地走出這種兩難的困境。

4.4 城市貧困問題的新形勢

在亞太地區，經濟的穩定增長可能通過以出口爲導向，已有數十年歷史的裝配和製造業在減輕一些最惡劣的基本需求貧困方面產生實質性進展，這些基本需求包括食物、小學教育和基本衛生保健（UNESCAP, 1993）。赤字仍然是大，與貧困的其他層面一起，特別是在那些與人居住有關的問題如房屋和土地、住房和社區、自來水、排水、排汙、電力、道路鋪設和定期廢物清理。這些貧困形式在所有城市持續存在，相對貧困和收入不平等現象一直有增無減。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的主要來源是土地價格上升，並遙遙領先於工資和收入的增加，特別是對低收入者來說，導致的結果是在土地所有權模式下日益擴大的經濟階層的差距。

在以前，城市貧困問題主要是與國家內的農村向城市遷移有關，來自農村地區較窮的移民成爲了那些在城市中無法掙錢謀生的貧民窟居民。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貧民開始自謀生路，同時農村到城市的移民仍然是新的貧民窟形成的一個主要來源。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高水準的城市化和直線下降的人口增長率在亞太地區較高收入的城市裏表現，農村人口下降已經達到極端水準，而且大多數國內移民越來越多地參與城市間的人口流通。農村向城市的移民迅速成爲全球化，農村地區在這些國家比如中國、菲律賓和印尼爲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地區、韓國、日本和世界許多其他地區的城市和農村提供勞動力。

特別是在那些主要的和候選的世界大都市區中，越來越多外國工人的出現，構成了巨大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問題，其中許多人是非法在這些城市居住和工作，對於這些人長久以來社會無法定義他們的構成是單一的種族還是族裔群體。1980 年後期，在日本和其他的亞太地區工業化的城市開始經歷了政府、大眾社會和傳媒對移民潮中被過分剝削的低工資的外國工人的仇外心理（Douglass, 1999）。

從 1995 年被新加坡政府，以無目擊證人涉嫌謀殺看護兒童罪名而被處以絞刑的菲律賓女

備 Flor Contemplacion，到包括日本的一些婦女性工作者目前被認定為從事建築工地，和危險品工業生產的外來男性勞工的配偶可以看出，外來移民勞工在一些亞洲國家工作的脆弱性，新的外來勞工開始出現在東京，首爾和臺北的一些地區，他們幾乎沒有法律和政策的保護以獲得公民的身份，甚至是長期居住的權利。因此種族和人種血統問題將會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給亞太大都市地區的帶來多元文化的將來。

亞太社會如何處理這些不斷增長的外國勞工人口，將會在未來的幾十年裏成為影響城市生活和政策的關鍵性的因素。不論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菲律賓女傭，被帶到日本從事性工作的婦女，還是在臺灣，韓國或是馬來西亞的低收入的藍領工人，如果政府繼續忽視這種全球性的現狀，結果將會是形成外國工人的集中居住區，在一些情況下，甚至能在主要城市裏達到非常巨大的人口比重。

不論情形如何，即使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也不能消除城市貧困的多樣性。通過這種持續徵募越來越多的外國勞工，以達到保持城市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性，經濟的繁榮和全球化延續的目的。

人口的轉移在接收國也導致社會的快速老齡化，照顧老人的需要已經跟不上老齡化增長的速度。從日本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韓國，臺灣，新加坡以及有可能的 2030 年的中國，這些國家的人口將達到負增長，結果將導致絕對人口的下降並且 65 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和絕對數量將持續性上升。在日本，65 歲以上人口的數量已經超過了 15 歲以下的人口數量。在這種趨勢下由於非勞動力人口的增加，勞動力人口身上的擔子將會更重。

1997 年的金融危機從根本上加重了亞太地區新的貧困格局。數十萬的外國勞工被無任何賠償地強制驅逐出境，面對糟糕的就業前景，使他們不得不接受自己正處在遭受金融崩潰的國家 (Douglass, 1999)。面對大規模的失業面前，大量的中產階級發現突然的收入減少，已經影響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如購買房屋。即使經濟開始復甦，前景的改善在許多家庭依然舉步為艱。當公民和政府都開始要求建立社會保障時，大多數國家在這個方面卻還沒有取得顯著的進展。在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當全職工作正在被臨時工和試用工取代，中低收入的家庭的困難將會成為城市發展的長期難題 (Kim, 2000)。

外國勞工、老齡化人口、中低收入階層不穩定的就業形式構成了城市貧困矩陣的新形式，沒有一刀切斷的辦法可以解決所有貧困形式的出現，但是創建一個特定的政策議程無疑可以更好的處理這些貧困問題，這其中包括更大的公眾參與以建立社會保障，建立創新性的住房模式和通過其他安排為獨身老人安排住房，改革基本的入境法規和民事法律，來保障外國工人在東道國享有等同于本國公民的工作、居住和使用公共服務的權利。

4.5 不均衡空間發展及對農村的忽視

亞太地區國家的政府部門通常給予他們的重要城市更多的關注卻往往忽視次級城市和農村。在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後曾被政策嚴重打壓的大都市地區的經濟重新快速的發展，在政策逆轉後大城市已釋放的被壓抑的後續力量正推動著中國廣大沿海地區城市的經濟實力的大規模遷移和集中 (World Bank, 1997a)。如上所述，在所有的亞太地區國家，空間格局都存在著不平衡，大都市地區總是佔有了大部分的國家人口、產業和資源的份額，並且份額還在不

斷加大。

不均衡空間的發展可能在短期內不會出現問題，高效率的大城市群被廣泛宣傳優於小城市，並且這種以水滴狀的空間之推動力也被現在的許多政府假定為抵消的趨勢，但是一些國家仍然顯示了長期不均衡發展的結果。在日本和韓國，農村地區已經稀缺年輕人，連基本體現城市功能的公車、鐵道交通，甚至是學校都消失了，只留下老齡化的人口管理大量的農業經濟。儘管那裏的家庭收入是令人滿意的甚至是非常的不錯，但是這些包括城鎮和農村的地區，占了大半個日本和韓國面積的土地，卻仍然保持著破舊的基礎設施，衰敗的社會服務和經濟潛力（Douglass，2000b，2000c）。

大城市也同樣依賴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和產業，需要農村提供食品，農副產品、工業原料、自然資源和能源。農村和城市的連接，往往是單向往城市流動，並不支持農村資源的經濟體系。城市爲了要從農村地區得到更多的水資源，常常在農村地區過度砍伐和污染，導致水資源系統的衰退而無法提供。最近東南亞靠近城市邊的森林大火揭示了對農林資源的破壞會給城市帶來巨大災難。

因此，有必要回到被遺忘的城市和農村相聯繫的地方，並且在長期可持續性發展的社會和經濟面前，如何使城市和農村的相互關係變得更加互惠互利是需要被強調和保護的。對改善城市和農村關係的關注，以及找到改善中轉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經濟前景，不能僅僅是局限於滿足大都市地區的要求。面對全球性經濟的持續的動盪，國家經濟的恢復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刺激整個國家的多元化全國經濟的增長，創造更多的內源性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這樣一種方式。

5. 前景

雖然政策經常孤立地討論主要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事實上都是息息相關的。就之前指出的一樣，在許多情況下當你想跳過一個問題處理下一個的時候他們會直接的變換位置。比如說，通過獎勵和優惠措施和做法以吸引全球化資本的投資雖然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並使大部分人口都增加了收入，但是卻大大破壞了環境，影響了城市社區的連續性和許多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而且還加重了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負擔使其更新的速度無法滿足需求。

對於改善亞太地區人口不斷增加的城市，作爲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作爲一個適宜居住的棲息地，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關係有很多先進的建議。現行的政策理論來自主要的國際借貸機構敦促各國政府從根本上改進城市的管理方式，把直接的控制和規章制度的管理者的身份，轉換爲方便公民以及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身份。這些建議還勸告政府停止津貼優惠和價格扭曲，創建更加透明和簡單的管理模式來減少通過收費制度運行的政府成本。

雖然很多建議值得考慮，但是他們也在政治上天真的認爲，他們對於國有企業和國有民間社會的基本假設成立。他們認爲在強大的全球勢力影響下國家是自治的，並因此隨時有能力採用更高的環境標準，這些假設歪曲了政治在經濟上的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錯誤的理解了民間社會和民主化政治機構，在制訂公共政策優先次序的重要性。政策的制定必須意識到全球化的意識，和動用當地地方的人力資源轉化爲行政上的力量，並把全球化的聯接轉變爲更

適宜居住和社會公正城市的能力。

解決城市問題的前景因城市的差異而有很多的不同，當遇到危機時的具體措施以及長久以來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差異出現時，這取決於各個權利聯盟的勢力轉換。雖然許多政府仍然限制真正的民主改革，因為一旦這些改革發生了事實證明政府將很難制止他們。即使在經濟緊縮的現今階段，當改革發生以後，公民將不再允許回到獨裁的統治或接受政府在名為非常時期的公民權利管制。

這些危機甚至在一些國家可能加強社會在解決政治改革上的能力，當公民開始敏銳意識到經濟崩潰，原因是因為政府部門的商業腐敗。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到處都會出現自由民主的政府，但它確實表明了管理合法化的危機，將使得各國政府更能在制訂代表公民和城市居民權利的公共政策上會探尋創新的體制。

管理和行政上的改革被巨大的社會工程超過，諸如建設城市和公民社會的工程在政治過程中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各國政府為了尋求民意支持，因此將被迫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解決宜居城市、公民福利和包括減少貧困這些問題上。

空間物理結構對於日常生活中對各階層的人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政治能量正在努力地引導建設的環境。在首爾和臺北，這種能量正在成為推動行政改革的社會運動的載體(Evans, 2000)。

崛起的民間社會正在創造一個新的城市政治體制，在這個舞臺上融合了複雜的外國移民和多元文化，並混合了各種性格、階級和種族。沒有解決衝突的機制，只是在大範圍內建立與公民協作的共識，會出現城市的議程屈從於支離破碎的矛盾，城市裏重新出現精英但卻沒有縮小居民生活的差距這樣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轉換治理的結構，包括加強地方政府的財政決策能力及人員素質是實現創建更加理想城市未來的一個先決條件。

回應亞太地區的主要壓力是正在發生改變的空間經濟結構，而全球化只是局部化的發生在日常體制的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城市化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區是以各自突出的形式動態發生的。正如未來的印尼，不會與未來泰國或任何其他社會現象，任何一個城市努力爭取較長遠的可持續性發展，將會極大的建立自身的經濟容量以應付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和可能遇到的其他問題。擴大這方面的能力反過來又要求城市有一個清晰的側重點，不僅僅要凝聚經濟或是集中世界市場上的消費力，而且也要形成政策上的社會舞臺，可以有意義地解決包括宜居性、環境、社會公正性之類的主要問題。

參考文獻

- ANGEL, D. and STOVE, M. (Eds) (2000), *A Clean Revolution in Asia*, Sheffield: Greenleaf (forth-coming).
- ATHUKORALA, P. (1989) Export performance of new exporting countries: how valid the optimis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 pp. 89-120
- BELLO, W. (1997) Addicted to capital: the ten-year high and present day withdrawal trauma of southeast Asia's economies, *Issues and Letters*, September-December, pp. 5-22.
- BRANDON, C. (1994) Reversing pollution trends in Asia,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1(2), pp.

21-23.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CASTELLS, M. and HALL, P. (1994)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21st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es*. London: Routledge.

CLARK, D. (1996) *Urban World/Global City*. London: Routledge.

COREY, K. (1997) Digital dragons and cyber commun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ublic policies and private partnerships to the planning of urban ar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 1, pp. 184-209.

DOLVEV, B. (1998) Power-pack par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6 August, p. 15.

DOUGLASS, M. (1998) World city formation on the Asia Pacific Rim: poverty, everyday forms of civil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M. DOUGLASS and J. FRIEDMANN (Eds) *Cities for Citizens: Planning and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in a Global Age*, pp.107-137. London: John Wiley.

DOUGLASS, M. (1999) Unbundling national identity: global migration and the advent of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s*, 23(3), pp. 79-128.

DOUGLASS, M. (2000a)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after the era of naive globalism, in: A. KUMSSA and T. G. MCGEE (Eds)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 (NRDP) Volume 1: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forthcoming).

DOUGLASS, M. (2000b) Inter-city competi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ian crisis, in: A. J. Scott (Ed.) *Global City-Reg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DOUGLASS, M. (2000c) Turning points in the Korean space-economy: from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 intercity competition, 1953-2000.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lifornia (forthcoming).

DOUGLASS, M. and J. FRIEDMANN (Eds) (1998) *Cities for Citizens: Planning and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in a Global Age*. London: John Wiley.

DOUGLASS, M. and Oot G. L. (2000) Industrializing c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Pacific Asia: toward a policy framework and agenda for action, in: D. ANGEL and M. STONE (Eds) *A Clean Revolution in Asia*. Sheffield: Greenleaf. (forthcoming).

The Economist (1998) Come back in five years: Tumen River project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ordinating, with North and South Korea,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a project to develop the Tumen River area), June, 347(8074), PP. 42-43.

EVANS, P. (Ed.) (2000) *Livable Citi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Livelihood and Sustainabil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FORNEY, M. (1998) NGOs in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7 play (<http://www.feer.com>).

-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pp. 69-83.
- FRIEDMANN, J. (1988) *Life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 New York: Transaction Books.
- FRIEDMANN, J. (1996) *World City futures; the role of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ILSENATH, J. and COLEMAN, Z. (1999) Disney-Park deal may not wave a magic wand over Hong Kong, *Wall Street Journal*, 4 November, p. A26.
- KAOTHIEN, U. and WEBSTER, D. (1998)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for Thailand in the content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Global Forum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Nagoya, December.
- KAPLAN, R. D. (1997) 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Atlantic Monthly*, 280(6), pp. 55-80.
- KIM, W. B. (2000) Economic growth, restructuring, and spatial impact with a focus on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in: *Proceedings from the OECD Korea Workshop on Spatial Policies and Issues*, Seoul, 8-9 March, pp. 40-57.
- KNOX, P. and TAYLOR, P. (Eds) (1995)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rean Herald (200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taled \$1 billion in April, 8 May. (<http://www.koreaherald.co.uk>).
- KWON W.-Y. (1997) Changing roles of planning profession in the eye of urban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 1, pp. 157-166.
- LUBMAN, S. (1999) Silicon Valley Far East, *San Jose Mercury News*, 19 September, p. E1.
- MARKUSEN, A. and GWIASDA, V. (1994) Multi-polarity and the layering of functions in world city's struggle to stay on to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8, pp. 167-219.
- McGEE, T. G. (1991)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in: N GINSBERG, B. KOPPEL and T.G. McGEE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pp. 3-2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cGEE, T. G. and ROBINSON, I. (Eds) (1995) *The New Southeast Asia: Managing the Mega-urban Region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MDC (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98) Cyberjaya: the dream city of the future.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3937/msc.htm>)
- O'ROURKE, D. (2000) Community-driven regulation: toward an improved mod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Vietnam, in: P. EVANS (Ed.) *Livable Citi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Livelihood and Sustainabil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 ORWALL, B. (1999) Disney's Hong Kong deal is valued at over \$3 b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15 September, p. B8.
- PARK, S. (1985)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the

- case of Korea, in: F. HAMILTON (Ed.)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Peripheral Regions*, pp. 311-334. London: Croom Helm.
- PARSONAGE, J. (1992) Southeast Asia's "growth triangle": a sub-regional response to glob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pp. 307-317.
- RIMMER, P. (1999) *Flow of goods, people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cities of Nor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6th Pacific Reg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Seoul, July.
- SANDERCOCK, L. (1998) *Towards Cosmopolis*.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Tokyo and Lond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EV, S. (1994)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 SASSEN, S. (1997) Cit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 1, pp. 11-31.
- Scientific American (1996) The Philippines bestseller (advertisement), 274(2), pp. 20-21.
- SHORT, J. R., KIM, Y., Kuus, M. and WELL-S, H (1996) The dirty little secret of world cities research: data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 pp. 697-717
- TAYLOR, P. (2000) World cities and territorial states under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19, pp. 3-42.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9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5*. Geneva: UNCTAD.
- UNCTAD (1996) 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reach \$325 billion in 1995: an all-time high. Geneva: UNCTAD.
- UNCTAD (200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Geneva: UNCTAD.
-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UNESCAP (1993) *State of Urbaniz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UNESCAP, Division of Industry, Human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
- UNP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199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1994 Revision*.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WILLIAMS, L. (1994) Asia's urban meltdown, *World Press Review*, 41(2), pp. 46-47.
- WORLD BANK (1993) *Indonesia: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a) *Sharing Rising Incomes: Disparities in China, China 202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RI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6/97) *World Resources 1996/97*.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